

伟大的祖国



西北大学德育教研室

和平

PDG

前言

1982年底，我们从一些兄弟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报道里，得到启发。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决定由我校德育教研室负责举办“伟大的祖国”讲座。

我国历史上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复兴，产生了很多民族英雄，他们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我们所说的民族气节，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正气和操守。

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形成没有经过象欧洲那样因蛮族入侵而产生的所谓黑暗时代，从秦汉时期起便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广大的领土上，由于共同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也就是各族人民彼此学习和共同提高的过程。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人民多次举行起义反抗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民族压迫。在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长期斗争中，我国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涌现出杰出的人物，他们对历史的前进作出了贡献。

我国近代历史就是一部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许多志士仁人和革命家为了民族的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爱国主义的英雄诗篇。

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找到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的正确答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结合，才是彻底的爱国主义。

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从上述的方面去理解，于是我们便增强了信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如果能够编写出一套简明扼要而又生动具体的教材，包括我国辽阔广大的领土、中华民族的发展、丰富的宝藏、壮丽的山川、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等；由于我们学校地处文化古都西安，所以教材中应包括这里的名胜古迹、碑刻石雕、文化异彩等等的内容；用这些教材向青年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为争取祖国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尊严和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而献身，作为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可以收到好的效果的。

基于这样的设想，我校德育教研室组织了十几位教师，一边编写教材，一边在“伟大的祖国”的总标题下讲授各自准备的题目。讲座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读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制订的《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83年7月2日）的文件。我们仔细阅读，深入讨论，觉得非常亲切，因为这个文件解决了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而且给我们指明了做好这项工作的具体途径。这个文件有这样的话：

“我们要坚持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提高人民群众和青年的爱国主义觉悟，并以此为起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下

去，步步上升，逐步地把广大爱国者的觉悟提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水平。”

这就是我们向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针。我们根据这个文件提出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内容和素材，对“伟大的祖国”讲座的题目和教材加以调整和充实。我们又从讲座中选出15个题目，把这些教材加以修订，汇集成册。我校德育教研室张立民同志在组稿和编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否则很难成书。这15个题目及作者是：《中国历史的魅力》，由历史系副教授林剑鸣撰稿；《江山如此多娇》，由地理系副教授雷明德撰稿；《可爱的多民族大家庭》，由西北史研究室讲师周伟洲撰稿；《伟大祖国的矿产资源》，由地质系副教授王俊发撰稿；《汉唐文化的异彩》，由历史系副教授林剑鸣撰稿；《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由德育教研室讲师张立民撰稿；《瑰丽的古典文学遗产》，由中文系讲师李志慧撰稿；《古代诗歌的爱国传统》，由中文系讲师李云逸撰稿；《唐代长安与西域各地的交往》，由中文系讲师武复兴撰稿；《近代爱国者的先驱》，由历史系副教授李宗洲撰稿；《五四运动及中国青年的爱国传统》，由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索士杰撰稿；《抗日战争中的几位爱国将领》，由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李永森撰稿；《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由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李祥瑞撰稿；《热爱大西北，开发大西北》，由经济系讲师任定方和地质系梁克荫合作撰稿；《宝岛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由地理系讲师叶树华撰稿。

我们感谢《光明日报》、陕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给我们的工作以热情的

支持。自从他们把我校“伟大的祖国”讲座的情况报道以后，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来信，索取教材。这无疑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我校党委很重视这项工作。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本小册子奉献给同志们，作为庆祝建国35周年的献礼。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同志们对这本参考教材的缺点和错误，给予批评和指正。

张岂之

1984年5月1日于西安
西北大学

目 录

中国历史的魅力·····	(1)
江山如此多娇·····	(14)
可爱的多民族大家庭·····	(37)
伟大祖国的矿产资源·····	(54)
汉唐文化的异彩·····	(64)
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81)
瑰丽的古典文学遗产·····	(103)
古代诗歌的爱国传统·····	(124)
唐代长安与西域各地的交往·····	(145)
近代爱国者的先驱·····	(159)
五四运动及中国青年的爱国传统·····	(181)
抗日战争中的几位爱国将领·····	(200)
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219)
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	(234)
宝岛台湾与祖国的统一大业·····	(252)

中国历史的魅力

林剑鸣

魅力，就是一种吸引人的力量。

“中国历史有什么魅力呢”？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艺术作品，象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斯特劳斯的音乐，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维纳斯、雅典娜的雕像，才对人们有魅力，而中国古代的历史，似乎只是那些灰秃秃的坟墓，厚厚的古书，积满灰尘的陈年老账，这些枯燥的东西有何魅力可言呢？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中国的历史，不仅有其迷人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足以使人为之献身；其魅力之大，足以使身处逆境的人，在无法活下去的时候坚持活下去，也使人在需要死的时候，从容就义，视死如归。这种魅力难道还小吗？有哪一幅画、哪一支曲、哪一尊雕像产生过这么大的作用呢？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我们陕西韩城出了一个大学问家，名叫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93）是有名的学者，他少承家学，读书很多，二十八岁时就承袭父业当上太史令。太史令的职务，负责记载政府、国家出现的大事，并观察天文星象，保存国家重要典籍。这是学识十分丰富的人才能担任起来的职务。年轻的司马迁这时踌躇满志，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

职”，决心要做一番事业，对前途充满美丽的憧憬。用我们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说，生活在他面前展示出一条洒满阳光和鲜花的道路。

正当司马迁在太史令任上一帆风顺的时候，突然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陷于人生最困难的绝境。

在司马迁三十四岁的时候，汉武帝得到前方的战报，说率兵前去抗击匈奴的大将李陵，兵败后投降了敌人。消息传来，汉武帝大怒。但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对这一消息表示怀疑，他根据李陵平时为人“事亲孝、临财廉、与士信、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表现，认为李陵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将。就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认为“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战斗是有功的，由于“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而兵败被俘，情有可原。被俘后降匈奴出于无奈，“且欲得其当报于汉”。司马迁从好的方面推测李陵的行为。当然，这种推测不免有些主观。不过，司马迁替李陵辩护，绝无个人目的，他同李陵的关系，“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连在一起喝杯酒的交情都没有。看来，他这样说纯属个人看法问题。但是，在专制主义时代，个人看法如果冒犯了皇帝，也是要处刑的。汉武帝正在气恼之中，听到司马迁的话以后，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当时，如果有钱可以用钱赎，但司马迁一介文官，又不会贪污，那里来的钱，只好接受宫刑。

宫刑是极残酷的一种刑罚，即毁掉生殖器。这不仅是对人身的摧残，而且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在“士可杀而不可

辱”的知识分子身上施用这种刑罚，真是比杀头还要残酷。司马迁在叙说自己受刑后的痛苦时，曾经这样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这还是身体所受的痛苦，更难过的则是精神上的折磨，他自己说：“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因此，他曾多次想到与其这样活下去，不如一死了事。对于当时的司马迁说来，死倒是一条最轻松的解脱之路。

但是，三十四岁的司马迁终于没有选择这条轻松的出路，而是忍辱负重，“隐忍苟活”，坚强地活下来了，直至几十年后才悄然离开人间。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司马迁活下来的呢？是历史。使司马迁生命之火不致熄灭的能源，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他认为有一件事比死还重要，就是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他自己说，为写这部史书，“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正是这股巨大的力量，支持着司马迁活了下来，最后终于完成一部上起传说时代，下至汉武帝，共一百三十篇的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而他自己也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苏联学者图曼语）。

历史是支持司马迁在绝境中生活下来的动力。

或许有人说，这是因为司马迁是个史学家，所以历史才对他产生如此大的魅力。其实不然，无论是谁，只要他懂得中国历史，历史就会在他身上产生力量，懂得愈多，力量愈大。

距今八百年前的南宋末年，著名的丞相文天祥在广东潮

阳兵败被俘。敌军知道文天祥是忠臣，企图招诱他投降。但他宁死不降，几次寻死未成，被敌人元军押解到首都大都（北京）。一路上他一直面南而坐，表示心向南方的宋。到元都后，元丞相以礼相见，文天祥长揖不拜，对元人的劝降，一概置之不理。高官厚禄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宋降臣来劝降，被他唾面大骂，宋恭帝降元后被封为瀛国公去劝他，也被他拒绝。元人知文天祥决无动摇之意，只好将他关押于低洼阴潮之土室，囚禁起来，企图动摇他的决心。但是，文天祥毫不动摇，只求速死。一直被关四年。有一天元世祖召他进宫，劝他说：“你拿事宋的忠义来事我，我当拜你为相。”天祥说：“我为宋宰相，怎能事二姓，只请你赐我一死，便心满意足了。”世祖见无望，只得将他杀死。

临刑的那天，文天祥被绑赴柴市，面对着刽子手的屠刀，毫无惧色。当地人听说文丞相就要被杀，观看者达万余人。天祥镇定自若，从容地问何处是南，然后整冠向南叩头，神色安然地就死。真可谓视死如归了。观看的人莫不唏嘘感叹。元世祖在杀死文天祥之令下后，立刻觉得后悔，马上派人到刑场传旨停止行刑。但当来人至刑场时，文天祥的一缕忠魂已随着满腔的热血离开了那丰伟、美皙的躯体。

文天祥为什么能在生死关头，表现得如此镇定自若呢？他曾经说过：求死而得死，何惧之有？他当然知道，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无例外地只有一次。然而他不怕死，求死，以死为乐，以死为荣，视死如归，原因何在？在他被俘后的诗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过伶仃洋》诗中有这样诗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最后这一句道出了文天祥的人生观：人人都不免一死，但是如果把自己一颗红心、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留在人间，记于青史，则是最值得的、最理想的结果。汗青就是历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文天祥视死如归的精神支柱。在《正气歌》中，文天祥又把历史对他所起的这种巨大作用进一步具体化了：他举出许多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强暴，不怕死的古人，做为楷模。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太史简，说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一则故事。齐国的大臣崔杼杀君而自立，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

“弑”是以下杀上，含有谴责之意。崔杼当权自然不同意这样记载，于是就把太史杀掉。不料，这个太史被杀后，他的弟弟仍然跑来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又被杀掉。但第二个弟弟继续来这样记载，崔杼无法，只得听其写下，再也不敢杀了。南史氏听说有两个太史被杀，也抱简前往准备书写。这种不畏死的精神即所谓“在齐太史简”。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晋灵公十四年，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走，未出境，其族人已将灵公杀死。董狐认为赵盾有责，因在史策上写“赵盾弑其君”。旧时誉为“良史”。《正气歌》还举出不少这样的人。文天祥从这些历史人物中吸取力量，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堂堂正正，其浩然正气贯串于天地之间，想到他们就没有一点怕死之感，死如甘饴，求之不得了。由此可见，使文天祥视死如归的还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

都有一种自豪感。但是，我们中国历史的吸引力量是不同寻常的。不仅中国人自己，而且连一些外国人也为之而倾倒。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拉铁摩尔（此人在一九四一年曾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当过顾问）说：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曾经有过任何别的文化都没有达到过的高度。他还说：“研究中国历史可以对整个人类投射出鲜明的光亮和指示出许多隐秘。”（《CHINA A SHORT HISTORY》）

中国历史的魅力在哪里？中国历史较世界其它国家历史具有如下三个特点，这就是它魅力的源泉。

（一）源远流长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据现代科学研究证实：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可上溯到距今三百万年前的早期猿人，和距今二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年的晚期猿人。而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发现的元谋猿人，已是一百七十万年以前的猿人化石。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兰田发现的“兰田猿人”距今为六十五万年至八十万年。一九二七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为六十九万年。一九七八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距今二、三十万年。这些发现，表明我们的祖先从很早就栖息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其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仅仅是历史久远，还不值得自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祖先进入文明时期是世界人类中最早的。

（1）文字的发明

文字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意义是人所周知的。在没有

文字的野蛮时代，人类的文明，进步得相当缓慢，因为人们无法将自己同大自然斗争的经验记载下来，传播开去。那些口耳相传的知识得以保存下来的数量是十分可怜的。但是文字发明以后，人类的进步速度远远超过以前几百倍。发明文字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进步，中国古代有“仓颉造字而神哭鬼泣”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文字发明的重视。

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一种，早在六千年前就产生了原始文字，半坡遗址中出现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就是最早的文字。而这种文字出现后，在使用中不断发展，距今四千余年前文字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它们不仅用来做书写记事工具，而且成为艺术品。不久前，在陕西扶风周原发现的三千余年前的周代甲骨一万余片，其字小如粟，在一片指甲大的甲骨片上竟能刻二、三十个字，用显微镜才能看得清楚。在没有发明和使用铁工具（更没有钢）的周代竟有如此技艺高超的微雕出现，这除了说明刻字技术的高度水平外，也反映了我们祖先对文字的使用和掌握达到多么熟练的程度。当然，这不过是一部分人的事。但也是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

（2）纸的使用

与文字紧密关联的是纸。当人类没有发明纸之前，所用的书写材料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羊皮、泥巴、草（苇）、石头等等。中国在殷商时代常常将字刻在牛骨和龟甲上，称为“甲骨文”，后来又铸在青铜器上，最普遍的是在竹片、木板上写字，称为“简牍”，或写在纺织品上，称为“帛书”。但这些器材不是太笨重就是太昂贵，对于传播文化有很大限制。只有发明了既便宜又轻便的纸以后，文字则如虎添翼，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界限，广泛地传播人类的文明。而首先发明

纸的，就是我们中国。

据记载，公元二世纪的东汉宦官蔡伦造纸。其实，他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纸的质量，早在他之前，纸就出现了。1957年在西安市灞桥西汉墓中，发现了公元前1—2世纪的“灞桥纸”。证明中国的纸在公元前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七个世纪以后，中亚人才从中国人这里学会造纸。后来，造纸技术传入欧洲。一千年后，1150年西班牙出现第一座造纸厂，1320年德国科伦出现第一座造纸厂，1390年纽伦堡建立造纸厂，而法国的造纸厂则在1189年才出现的。这些事实是世界公认的。

(3) 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印刷术，公元十一世纪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实际原理与近代印刷术是一致的，但德国的第一座印刷厂是1450年在美恩兹建立的，意大利则在1460年。

(4) 火药的应用

中国人最早学会造火药。早在秦汉时代，道家通过炼丹活动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公元十世纪的唐代，人们已会制造火药。十二世纪的宋代出现用于战争的霹雳炮。后来，蒙古人从中原将制火药的技术传给阿拉伯人。十三世纪欧洲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火药的知识，直到十四世纪他们才学会制造火药。

(5) 指南针

汉代已有“司南”，但实际应用更早。秦时的方士徐福，已能漂洋过海，可能已有指南针。又有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三千多年前的殷末，就有中国人横渡太平洋到达南美。有人认为传说中的扶桑国就是南美的墨西哥。如果这些推测不

错的话，应当在那时中国人就懂得使用指南针了。

(6) 地图的绘制

不久前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距今 2100 年的帛地图，是汉代长沙国部分地区图，相当今湖南、江西、广西、广东交界处。这里大山起伏，地形复杂，用现代化测绘工具也不易绘得准确。其中一幅地形图比例为十八万分之一，其河流、山脉、地形大致无误。据研究，这在没有高空测量技术手段的汉代，只有用“间接测量”的方法，以数学的“重差法”计算才能达到，而这种方法在今天已经失传了。所以，外国人认为这是个“谜”。

(7) 丝绸的织造

中国人民学会织造丝绸也有悠久的历史，据说在黄帝时代人们已学会养蚕、织丝绸。到了汉代，中国的丝绸达到极高的水平。汉墓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重不足一两，其精美程度由此可见。

中国的丝绸在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大影响，它通过“丝绸之路”传到遥远的西方。罗马的皇帝以穿一件中国丝绸制的衣服为荣。人们就把中国称为“丝之国”（赛里西）。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许多发明、发现均为世界所瞩目。如今我们能看得见的万里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等等，被称为“奇迹”，正表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震惊世界的高度文明。其中尤其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被视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古代的文明对世界进步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二) 兼容并蓄

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兼容并蓄，即不仅

将自己先进文明传播出去，而且不断吸收周围的和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先进文明。这就使我国的历史和文明，犹如长江、黄河一样，在向前奔流的过程中不断汇入各支细流，使自己更加丰富多彩、雄浑健壮。

仅以食、用两项为例，我们今日的生活习惯，乃是不断吸收外族、外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果。如在秦汉以前，中原人是不知使用桌、椅的，人们席地而坐，进门就脱鞋，和现在朝鲜、日本人的习俗一样，这对于写字、做事当然是不太方便的。汉代以后，从西域传来桌、椅，当时称为“胡床”。从此，起、坐方便多了。从西域传来的有胡琴、琵琶、葡萄及葡萄酒、苜蓿等。秦、汉以前中原人只知吃米，不知吃面，就是麦子也是用来煮饭，汉以后才从西域传来面食做法。从留下的名称也可看出它们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如烧饼称胡饼，汤面称汤饼，饺子称煮饼，凉拌面称水浸饼等等。

就连牲畜也通过中外交流而使品种有明显的提高。秦代和汉代前期的马，个子较低，质量较差。汉武帝时，专门派大将李广利率兵到今中亚地区（当时的大宛），取“汗血马”、“天马”，甚至不惜数十万军队和花费大量金钱，用多年的时间，取回良种马，回来与中原马杂交，结果产生了较秦代马质量高得多的汉代马。不久前，在兴平县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汉代鎏金马，同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陶马相比较，就可看出这种交流的结果，大大地提高了马的质量，出现了极好的品种。

我们古代祖先是不惧怕外国文化的，正如一个健康的人不害怕吃各种食物一样。在唐代，有三百多个国家都派有使

者到长安。波斯的商人占了长安一条街。阿拉伯、大食的商人也很多，乾陵上有王宾雕像，共 61 个国家的代表，其中可考的有波斯都督。据说，他们都是武则天时代到唐朝来朝贡的。这不但说明唐朝威望之大，也表明中国人民不排外，不媚外，对外国文化兼容并包，利于我者吸收之，不利者扬弃之。这是中国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连绵不断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是连绵不断。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

英国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 J. Toynbee)用毕生力量写了一部十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被资产阶级史学家尊为“经典”的史学著作中，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分为二十一个，其中最古老的有六个，即埃及、苏末、米诺斯、古代中国、马彦和安弟斯文明。而印度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则都远在这六种文明之后。这最早的六个文明流存于今的，只有中国和埃及文明了。而埃及文明也曾有长时期的中断，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一直不断。

在世界古老的文明中，具有中国如此长期的、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是绝无仅有的。有的国家和地区，在遥远的古代曾达到极高的文明，然而后来却中断了，他们的历史随着逝去的岁月而消失。如太平洋中的玛雅人在几千年前就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他们所知道的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与今天以高度精密仪器和近代数学计算的时间相接近。又如苏末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计算出月球自转时间，与现代计算相差无几。然而，玛雅人、苏末人后来竟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的文化怎样消失的？这都成了不解之谜。